

新 智 慧

文 集

第 2 辑

财会月刊杂志社 编

版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新智慧文集

第2辑

财会月刊杂志社 编

出版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智慧文集. 第 2 辑/财会月刊杂志社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430-9852-7

I. ①新…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3917 号

编 者:财会月刊杂志社

责任编辑:徐 帆

装帧设计:陈 艳 喻 琼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中闻集团武汉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观今鉴古

那些年,冲破重围的跨国婚姻	1
新四军“梅花桩”战术布阵阻敌	3
八国联军中的“中国军团”	4
民国时代的汽油荒	7
中国最后一批太监的归宿地	9
末代皇帝的抄袭丑闻	11
梦露饭局:赫鲁晓夫席间会美人	13
摧毁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一场空难	14
玩一把“潜伏”扳倒“大老虎”	15
降臣是如何当上宰相的	16
道光时期的“人才荒”只因一人	18
一枚戒指改变命运	19
费祎之死,大意了	20
雍正赐死“第一巡抚”	21

宋仁宗的自守之道	22
李鸿章善做思想工作	23
明成祖也曾有跨国恋	24
康熙曾将巧克力当西药	25
年薪过千万,孟子为何要辞职	26
丑女进谏收奇效	27

名士风流

六小龄童的爱与恨	28
巩汉林:“婚姻学校”校长	31
白百何:这个妞幸运有迹可循	34
中国第一女导演杨洁	37
吴镇宇:在行走中等待	38
李雪和李冰冰患难姐妹情	39
宋祖英不让他人的好意尴尬	41
刘烨:家有水果仙妻	42

朱自清自轻不失重	43	人性暗箱	72
白先勇：深耕不辍的戏剧文化人	44	要义微言	
白宫“御裁”乔治·德帕里斯	46	无花果树的哲学	73
叶企孙：大师们的大师	47	当你抱怨时，幸运已经转身	74
民国闺秀张充和的感情往事	48	谁偷了珍珠	75
复旦女神严幼韵：每天都是好日子	50	不出错是核心竞争力	76
京剧界“四大名爹”	52	美玉有瑕，指与你看	77
大师的背后	53	没有弱点和两个弱点	77
庇隆夫人，首位女总统的悲喜剧	54	太阳不能同时照到篱笆的两面	78
感悟人生		哲思一点	78
是谁在让你不开心	56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79
有一种和谐叫自立	58	筷子悟语	79
最懂散财的人	60	什么叫眼光	80
蓝花大海碗	61	井里的狐狸	80
无明的人是世间最可怕的人	62	让路	81
坐在路边为你鼓掌的人	63	授之以渔	81
耐得住寂寞	64	一尺为戒	82
读书是一件寂寞的事	65	铁丝前的鹅	82
美人计，从来都是馊主意	66	成功之道	
无事出来喝盏茶	67	唯有努力，能化逆境为风景	83
开在玻璃上的玫瑰花	68	唱出中国好声音	84
最难的动作	69	逆耳未必是忠言	85
可怕的“稻草定律”	69	幸运是努力好久才发出的光	86
心中的魔镜	70	做最美的叶子	87
给国王留字条	71	“打屁股”的成功底线	88
放下是人生的洒脱	71		

一把泥土赚了500万元	89
抓大放小的临时翻译员	90
倒过来的成功	91
给自己一个“间隔年”	92
把指指点点当成指点	93
亡者香水	94
天暗下来,你就是光	95
像蜗牛一样坚持	96
“网”出个亿万富豪	97
满足易满意难	98
我从巴菲特身上学到这三件事	99
人生终会出彩	100

探索发现

那些由爱引发的啼笑皆非	101
家庭机器人,卖萌来袭	102
动物睡觉也蛮拼	104
海洋生物的神奇技能	105
狼的尊严	106
博物馆为什么要用蓝鲸代替恐龙	107
藏在地下的城镇	108
知道这些,你也能进哈佛	109
家族的“盾牌”	110
瑞士“搭伙养老院”	111
希腊人的懒	112
不弯腰的习俗	113
越南人的性格	114

英格兰有个剧毒花园	116
破车满街飞	117

市井百态

漂亮堂嫂不风流	118
美女代孕	121
谁在楼上	122
张桥的口号	123
寒露	124
白送的房子	126
女儿在城里住别墅	128
开个玩笑而已	130
失眠治疗法	131
怀璧	132
整治	133
咱喝酒的人	134
两声呼喊	135
同桌的你	136

养心养生

健康需要动点“粗”	137
健康运动App靠谱不	138
30岁后,每十年有个坎	140
胃病专家养生有高招	142
总感觉很累,你知道原因吗	143
少得病的秘诀	144
长寿老人的养生秘诀	145

这八类人免疫力最差	146
小养生,大功效	147
心因性失忆症:心灵的避难所	148
变变呼吸,为健康造福	150
名医的养生茶	151

红尘有爱

不负自己	152
和你同步一件事	154
继母的遗物	156
窗外有只啄木鸟	159
假装父亲来爱你	160
寄往伦敦的爱情	162
雪色情书	163
你是我最亲爱的柠檬	164
愿无岁月可回头	165
你别怕,有我在	166
我也是个父亲	167
今天运气真好	168
七年之痒的关口	169

天方夜谭

情箫	170
厨子报仇 十年不晚	171
神灯魅影	174

画缘	175
追杀令	177
少年江湖行	178
降龙十八子	181
死法	182
萝卜换宝马	184
傀儡戏	186
亲家	188
魔术师麻一	190
抱琴	191

笑口常开

就想生病	192
今天谁洗碗	193
拜访请预约	194
当乞丐	195
快点上菜	196
舍卒保车	197
聪明的律师	198
一个酒鬼的保证书	199
独特推销法	200
有此一招	200
遇到一个大公司	201
售房秘籍	202
厕所在哪里	202

那些年,冲破重围的跨国婚姻

□李天震

现今,跨国婚姻已是寻常事。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里,国人几乎谈涉外婚姻而色变。

由于工作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笔者就曾亲历了马里留学生蒙科罗·苏恩卡里与中国姑娘的跨国婚姻。1981年10月中旬的一天,当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前身)的马里留学生苏恩卡里赴京求见马里驻华大使,将两张鲜红的结婚证平摊在大使面前时,这位资深外交家大吃一惊:“啊?真有此事?!”他没想到,一个非洲青年竟能如此顺当地同中国女子在中国完婚。

大使的诧异不是没有缘由的,它起因于对中国一个特殊时代的记忆。

陈老总拍板的一桩跨国婚姻

1966年初夏,中国的“文革”运动正迅速升温。上海同济大学喀麦隆留学生杜马和同班中国女生金晓荣却偏偏在此时“不合时宜”地向有关方面登记结婚。在当时那样的情势下,后果不难预料,非但申请未获批准,反倒引火烧身招来是非,直至最后金晓荣被发落四川,两人被迫劳燕分飞各奔东西。

“大串联”开始后,全国红卫兵热情高涨,不花一分钱成群结队走遍大江南北。金晓荣在大潮的裹挟及“掩护”下,回到上海直奔心上人而去。不料风声走漏,火车刚进镇江站即遭截留,同济大学红卫兵不由分说便将一个弱女子遣送回安徽老家。

在上海无书可读又不得与情人相见的杜马心灰意冷,他决定取道北京回国,并把这个决定写信告诉了金晓荣。金晓荣闻讯日夜兼程秘密赶往北京,终于在金桥饭店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爱人。不想就在此时,红卫兵犹如“天兵天将”又一次不期而至。于是风波再起,“官司”一直打到了外交部部长陈毅那里。最后由陈老总拍板,有情人总算终成眷属,他们在北京结了婚并一道登上返回喀麦隆的飞机。

自杜马和金晓荣之后,“文革”十年中国几乎再

无一例跨国婚姻。那些年月,在中国和外国有情人的心头,“异国鸳鸯”始终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

在邓小平干预下完婚

即便在新时期的初始,春回大地乍暖还寒,阴霾一时仍很难完全散去。此时上海又发生了一件“通天”的跨国婚案。

1977年,复旦大学法国进修生奥迪尔·皮尔坎同中国小伙子田力在田径场上一见钟情。他们一个是学校的女子短跑冠军,一个是学校的男子跳高冠军,对体育的共同爱好让他们走得越来越近。然而当他们提出结婚申请时,历史再次重演:婚请遭拒绝,田力被隔离。

奥迪尔被眼前的一切震惊、激怒了,她不明白两个年轻人的爱究竟触犯了哪条“天规”。姑娘一连写了几封信,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求援,向法国总统求援,向法国国民议会议长求援。姑娘的真诚打动了法国政要,他们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奥迪尔的心愿。后来在复出中国政坛不久的邓小平的干预下,最终玉成此事。

1977年9月27日,法新社记者从北京发出报道:“中国领导人今天批准法国留学生奥迪尔·皮尔坎同中国工农兵学员田力结婚。”报道特意指明,“这个决定是‘文革’以来没有先例的。”

有了这一案例,中国地方当局在受理涉外婚姻时即有了可援之据。依凭中央政策,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会同民政部门建立了一套受理跨国婚姻的临时机制,自1978年起为一对对异国情人铺设了走向“红地毯”的通道。这个临时机制一直运行到1983年中央政府首度颁布《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结婚登记的几项规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恩卡里作为1966年以来第一个在上海同中国公民结婚的非洲人受到了马里大使的特别关爱。

大使说：“他若再娶，你可起诉他。”

苏恩卡里是1976年来到中国的，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年汉语后，次年进入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1979年夏季，该校部分中外学生发生冲突。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作为市府外办工作人员，我同一些外国留学生有过多次接触，苏恩卡里便是其中之一。起初他情绪十分对立，经过反复沟通，逐步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慢慢便“化敌(对)为友”，最后如他所说，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加兄弟”。

1981年7月的一天我去学校看他，小伙子一反常态显出了少有的严肃和拘谨。几番嗫嚅后他终于吐出了一段话：“我很快就要毕业，在回国之前，我想和一个中国姑娘结婚，她叫董美丽。李老师，你看中国政府能批准吗？”

我微微一笑了一下对他说：“只要你们的选择是负责任的，彼此真心相爱，又符合婚姻登记条件，中国政府有什么理由不批准呢？”

苏恩卡里面有难色地说：“可是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非洲人能同中国女孩子结婚。”

“那么，不妨你来领个头，当NO.1吧！”我的鼓励坚定了小伙子的信心，当年10月13日，结婚证即送达苏恩卡里手中。

第二天他打来电话：“昨天我领到了结婚证。告诉你，老师，我流泪了……”

几天后，苏恩卡里带着结婚证飞往北京。

眼前两张鲜红的结婚证着实令大使非常激动，他当下决定：“我要为你们举办一场隆重的婚礼！”

于是，董美丽的母亲被请来了；近四十个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其中包括12位大使被请来了；几家外国通讯社的记者也被请来了。10月31日这一天，婚礼大厅中央高悬马、中两国国旗，马里大使身披国旗绶带亲为这对异国新人主婚。他深情地说了一段开场白：“这几年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允许中国人同外国人通婚，但我只是耳闻，未曾目见，而且听说与中国人结婚者又全是欧美人士。今天，我亲眼看见董美丽小姐嫁给了我国的留学生。事实告诉我，非洲人可以同中国公民结婚了，对此我由衷感到高兴。”

不知是一时兴起还是本来就该有这么一个程序，只见大使走近两位新人，在马、中两国国旗前，当着特邀法律证人的面对董美丽说：“依照伊斯兰教规

和马里的法律，在事先征得女方同意的前提下，男子可以娶妻四人。现在你可以直接问苏恩卡里，他是否还打算娶其他的妻子？”

董美丽遵嘱向苏恩卡里提问，苏恩卡里当着大使和法律证人的面，向国旗郑重宣誓：“同董美丽结婚后，绝不再娶。”

大使随即对苏恩卡里说：“你既已宣誓只同董美丽一人结婚，那么你回到马里后如再和他人结婚便是违法，明白吗？”

苏恩卡里答“明白”，并签字为证。大使又对董美丽说：“尽管马里法律允许男人娶四个妻子，但苏恩卡里已正式宣誓同你婚后不再他娶，今后他若失信，你有权对他起诉。”

“非、中人民是一家人”

对苏恩卡里婚事的反响超出了人们的料想。不久，在上海非洲学生中又接二连三出了好几个“第一”：第一个扎伊尔人马贝嘎结婚了，第一个布隆迪人德奥结婚了，而且同样受到本国驻华大使的青睐，为他们在北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1982年初，即将回国的苏恩卡里又按中国习俗在学校办了一个婚礼，邀请老师和同学分享他新婚的喜悦。我和学院薛喜民副院长应邀同马里驻华大使的代表一起在主桌就座。大使代表和薛副院长分别致辞后，塞内加尔留学生伊迪宣读了一封国外来信，写信人叫萨马克，是两年前刚从上海华纺毕业回国的马里留学生，他在信中写道：“我对这桩婚事既惊又喜，这个喜讯在马里电台整整播放了一个星期。”

随后，苏恩卡里起立讲话：“自从去年10月13日以来，我一直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因为从那一天起，我就是半个中国人了……”

2月1日，苏恩卡里偕爱妻董美丽取道北京回国，我因有事未能前去送行。苏恩卡里特意托学校留学生办公室主任张金泉捎回一句话：“请转达我对李老师的感谢！”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而骄傲。

“婚姻变化是社会进步的缩影。”中国跨国婚姻迅速增长的时期，恰恰发生在改革开放这37年里，这也折射了我国社会组织、时代思潮的日趋多元与开放。

(摘自《档案春秋》)

新四军“梅花桩”战术布阵阻敌

□张可

有人说,打仗要靠天赋,熟读兵法百条不如临阵心生一计。罗炳辉,这个从云南山区贫苦农家走出的少年,似乎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天赋。没上过一天军校的他,凭借多年行伍积累的经验,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1941年4月,新四军二师副师长罗炳辉抵达六合时,带了两个旅。他的任务是巩固与发展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掩护麦收的任务。这个任务看上去只要被动防守,但罗炳辉认为,与其整天提心吊胆,不如主动把敌人引出来吃掉。部队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开拔了。大家知道,长江对岸就是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汪伪政府的首府——南京,你罗炳辉还生怕鬼子不知道新四军来了?没错,我就是要上门叫板!4月10日至14日,新四军第二师以第四、第五旅及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第四团各一部,向侵占扬州、仪征、天长地区的日伪军展开反“点线”(据点和封锁线)作战。罗炳辉连克仪征、天长等地多处据点,并进袭天长县城,歼敌150余人。

短短4天,新四军多路出击,处处告捷,令日寇胆战心惊,急忙加强防御,并集结力量,准备进犯六合——消除江北这一“大患”。4月16日夜,驻扬州等地日伪军700余人携带轻重武器扑来。此时身在六合的罗炳辉,已经“恭候”多时。

“梅花桩”阵法,简单说就是把部队打散,成为一个个小组,像钉在地上的梅花桩一样纵深分布,同时各部相互协同。这一阵法的发明者正是罗炳辉,六合金牛山一战,是“梅花桩”首次登场。

战场选在六合县城东北40多里的金牛山、峨眉山间的洼地,这里地势起伏,村庄稠密,便于隐蔽。罗炳辉手上兵力是2个团加1支旅直属队。见到地形甚佳,他索性把梅花桩用到极致:15团在大井赵一带,警戒六合及金家集方向,并以“班”——最小的军事

单位分组活动。如敌来犯,则加以阻击,并迅速报告;旅直属队驻泉水寺、癞子山一带;12团团部位于金牛山南面的大陈庄、钱洼一带,所属三个营第一营驻车蓬庄、和尚庄一带,向移居集、谢家集方向警戒,并控制樊家集通向大陈庄的道路;第二营主力位于乌山西南一带,向八百桥方向警戒;第三营驻厉马庄等地,向樊家集方向警戒。以上各部互为犄角,相互支持。

罗炳辉“梅花桩”的理念,像极了300多年前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采用的“鸳鸯阵”。这种阵法把部队组成12人小队——也恰好是一个班的规模,持长短武器相互配合。在此之前“半农民”的明朝卫所兵,列传统方阵面对职业军人出身的倭寇,一旦前排失利,整个队伍极易崩溃。而鸳鸯阵一出,战场立即扭转,单兵能力极强的倭寇遭到吊打。

17日天亮前,日军进入新四军的防区内,他们故意走田间小路,却被一支流动巡逻的“梅花桩”发现,战斗立刻打响。新四军故意败退,诱敌深入,但到了五里墩高地时,开始集中火力全面压制,敌人已无法再前进一步。

早上7点,新四军开始反击,经过激战,成功将战线反推10多公里。日军为摆脱覆灭厄境,做疯狂反扑。新四军战士则效仿“梁山好汉”,手持朴刀,组成突击班,绕到敌后砍死敌人的重机枪手和掷弹筒班组。敌人失去火力支援,攻势顿挫。三营迅速打退了日军的反扑,乘势夺回大陈庄,并集中火力将残敌全部压在陆家洼,形成合围。上午11点,新四军弹药打光,随即舞起朴刀肉搏,日军开始溃逃。

半天时间,敌700余人的部队,500余人被歼,新四军还缴获轻重机枪9挺、步枪40余支、掷弹筒2具。新四军仅牺牲54人,在兵力弱势的情况下,罗炳辉打出了1:10的战损比,堪称大捷!

(摘自《扬子晚报》)

八国联军中的“中国军团”

□佚名

1900年8月14日,大清帝国的首都被八个国家的侵略军攻陷,这个日子,可说是黑暗的中国近代史中最黑暗的一天。在趾高气扬的洋兵中间,掺杂着不少黄皮肤、黑眼睛的士兵。他们不是日本兵,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更不同寻常的是,这些中国兵不是阵前倒戈的懦夫,也不是临时抓来的汉奸,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英军”。

“以华制华”的华勇营

故事要从5年前说起。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列强们纷纷参与瓜分中国的盛宴,英国也想割一块港口去,便强占了威海卫港,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

1898年7月1日,刑部尚书廖寿恒等代表清政府,与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了《订租威海专条》。然而,在签字后,另一个难题摆在了英国殖民者面前——当时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发愁,光靠一纸空文难以实现殖民统治,想要在威海站稳脚跟,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做保证。然而,几乎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军事力量。于是英国想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中国——在威海卫组建一支中国雇佣军。

英国历史学家哈菲尔德在《中国海岸的英印军队(1775~1985年)》中记载,威海卫人对于这群突如其来占领了自己家园的蓝眼睛、白皮肤的外国人带有普遍的敌意,大多数人不愿应征。

最初的招募举步维艰,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应招。英国人立刻调整策略——提高薪水。根据当时《山东时报》上刊登出来的招兵广告:“一名士兵一个月的军饷是8两银子,一个小队长会达到12两,并且全天候供应充足的大米、面粉、肉和干柴,而且每个季节的制服都是免费提供的。如果在入伍后两年内没有违规纪录的话,每个士兵还将得到30两银子;那些在训练中表现优秀、成绩突出的士兵还会有额外的奖励”。这对于当时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中国农

民来说,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

与此同时,英国也违背了当初只在威海卫一地招募士兵的承诺,他们将招募范围扩大到了直隶和东北地区。招募对象也由单纯招募农民转向清军的退役官兵,如此,应征者逐渐多了起来。

1899年,一支拥有七个连,共有军官和士兵534人的雇佣军团在威海卫正式成立了。这支部队被称为“华勇营”。

这支雇佣军充满了殖民地色彩:华勇营中所有尉级以上军官是英国人。华勇营的副指挥布鲁斯中尉在报告中写道,“这支部队编制齐全,设置步兵连、骑兵连、机枪连,以及炮队,并拥有自己的军事乐队和卫生队。并且每个连都配备了从香港、上海和杭州等城市的现代化学校中招募来的精通英语的翻译人员”。随后,华勇们戴上别着“中国军团”徽章的头巾,辫子裹在头巾里,就像个印度人一样。

华勇营配备的武器,是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也没能成为建制装备。由此可见,英国殖民者对这支雇佣军的期许之高。

1900年的春天,驻威海卫的英国当局按照条约设置租界边界,并在边界埋设界桩。这行为刺激起了威海人民朴素的爱国爱家情绪,抗议活动不断发生。于是英当局便派华勇营武力保护勘界。

华勇营的第二连连长中尉巴恩斯,在军营中写了大量日记,详细记录了华勇营在1900年前后的活动情况,他把日记结集,并于1902年在伦敦出版,名为《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

按照巴恩斯的记载:“4月28日晚,英国人已在卧龙西北山后坡等处,埋上了刻有‘大英租界’字样的界石25块,李希杰等中国官员就近住在界外的东道头村丛家庙,而英国官员则在华勇营的护卫下在相距三英里外的垛山脚下安营。当晚,附近约600名

群众来到东道头村向李希杰等人申诉,村民代表江正己宣读了他写好的《请愿书》,痛斥了清廷官吏的卖国行为并恳请其停止划界。”

然而,和平请愿没有任何效果。5月5日下午2时30分左右,以彭罗斯为首的15名英国勘界人员刚刚埋完第32块界碑,大约有1500多名愤怒的群众蜂拥而至,他们手持铁锹、锄头、木棒和石头迅速逼近。彭罗斯的头部被石块击中,随后他开枪击倒了3名群众,然后朝华勇营军营方向逃窜,并不时向追赶的群众射击。被激怒了的群众毫不畏惧,继续向前猛冲,双方很快混战到了一起。

彭罗斯的头部和腿部被连刺三刀、击倒在地,华勇营的士兵终于向自己的老乡们开枪了,并拼死从人群中救起了彭罗斯。

因为普通百姓不懂隐蔽,很快就成了华勇们的活靶子,19人当场丧生。其中有一人,还是华勇营第四连一名士兵的父亲。面对这悲惨的一幕,该士兵却毫不动摇。即使在他们的英国军官自己看来,这名士兵也有足够的理由离开华勇营,但他还是“坚守岗位”,意志坚定地选择了留下。这次流血事件,被称为“威海惨案”。

华勇营士兵对自己的父老乡亲毫不留情的杀戮,获得了他们的英国上级的一致好评,巴恩斯写道:“在外国军官的指挥下,让他们去和自己的同胞对抗,他们没有吭一声,没有发出丝毫怨言,所有的人都显示出巨大的热诚!”

对于华勇营在“威海惨案”中的出色表现,英国驻华大使窦纳乐向威海当局发了一封嘉奖电报:“向鲍尔中校表示祝贺,为了他的华勇营出色的表现”。

山东人民因受到的侵略燃起怒火,他们会合成更大规模的反洋教、灭洋人的义和团运动,并由山东境内迅速蔓延至京畿地区。1900年6月,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被义和团和清军围攻。为了解救围困中的各地洋人,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兼八国联军统帅西摩尔中将率八国联军进军北京。然而,西摩尔联军在半路上被清军截击,自身难保,求援的电报接连不断。

刚刚有过“靓丽表现”的华勇营,获得了英国的更大信任:华勇营正式被纳入英军建制,换上了陆军部队的军装,称为“第一中国军团”。这时,英国政府已经把不将该兵团用于租界地以外的任何军事行动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华勇营的中国士兵从此和

八国联军一起,对自己祖国的人民进行蹂躏和屠杀抢掠。

天津之战“立功”

根据巴恩斯的记载,华勇营屡有惊人表现。1900年6月21日,陆军上校鲍尔带领从华勇营中精挑细选出的第一批士兵200人,包括192名中国士兵和11名英国军官,乘坐英国军舰“奥兰多”号前往天津,前去解救被围困在天津的西摩尔联军。

抵达天津后,中国军团参与的第一场战斗是攻打天津机器局东局。天津机器局东局,人们习惯称之为“东局子”,它是清政府在华北兴办的最大的兵工厂。东局子处在一个炮轰天津租界很有利的位置上,而且它是从大沽开进天津的必经之地,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联军决定偷袭东局子。6月27日,由俄军率先对东局子偷袭,遭到了扼守在这里的清军和义和团部队的猛烈还击。

随后,英军的鲍尔上校接到命令,带领华勇营前去增援俄军,结果在路上遭遇到了准备增援东局子弹药库的一支清军骑兵部队和一群义和团团众。巴恩斯写道:“我们丝毫没有理会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子弹,排枪射击非常有效,命中率很高。非常幸运的是,敌方持有许多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旗帜,这有助于我方准确的选取射击目标。这些士兵们表现得完全像一个老兵,……而且他们的群射技术非常好,枪枪命中目标,冷静得如同在打靶场练习射击时一样。”华勇营的出现,保护了俄军的左翼,并有效地拖延了时间,后来大批联军赶到,结果彻底扭转了战况。东局子的失守,使得大沽通往天津的通道被打开。

7月3日,联军抢夺老龙头火车站,妄图占据这个通往京、津、沽的交通枢纽。整个战斗激烈异常。联军与清军进行反复拉锯,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战斗次数最多,维持时间最长,最为血腥的一次战斗。最终义和团和清军士兵弹药耗尽,退到了火车车厢中与敌人展开了肉搏。在车厢里肉搏的就有华勇营的兵。

这些同为中国人的士兵互相扭打在一起的时候,不知他们有没有诧异,为何敌人长得像自家兄弟?但中国军团的士兵没有丝毫迟疑,因为他们屠杀同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7月6日,有一门清军大炮总在轰击天津使馆,但是,这门炮隐藏得非常好。于是,联军派出一队侦

察兵去寻中国人的三磅炮的阵地。巴恩斯记录,“华勇营副总指挥布鲁斯少校带领的华勇营士兵,在英国军舰巴福鲁号火力掩护下,两次奉令进入一个村庄,不巧,敌人隐蔽良好。向他们持续猛烈地射击——布鲁斯少校腹部被划开一个大口子,极其勇敢的艾斯达尔准尉也受重伤。”这是一次没有效果的侦察,但是华勇营的士兵在炮火中逃命的路上,还一直不忘抬着英国皇家海军准尉艾斯达尔,即使他已经身受重伤,快要一命呜呼。

从7月9日至14日,联军开始向天津城发动全面总攻。中国军团主要负责运输英国军队的大炮和弹药,护卫和协同香港炮兵,向西机器局军火库发起炮击。在他们的掩护下,日军迅速占领西机器局,随后将之焚毁。

巴恩斯的书中还记录了一个场景:美国步兵受到严重创伤,迫切地需要担架和医护人员的治疗,所以皮埃尔少校率领华勇营第一连和第七连冒着生命危险去支援美军。但是,当美军军官发现这些增援部队时,他立刻站起来,焦虑不安地挥手示意他们退回去,因为这里正是炮火最密集的地方。但是那些中国士兵仍然鱼贯小跑过来。皮埃尔少校又发现美军的弹药差不多都快用完了,于是欧理藩中尉又率领第六连的士兵运送新的武器弹药过来。但是欧理藩中尉和驮着武器的骡子都牺牲在路上了,不过中国军团的士兵们仍然冒死前行。随后,华勇营拖住了前面大量的敌军,确保了日本军队右侧不受任何攻击。

华勇营在天津战斗中的表现,为他们迎来了一项殊荣——他们被允许佩戴仅由英国精锐陆战部队佩戴的一种特殊勋章。这个勋章上印着天津城门,城门的拱门上有用汉字写的“天津”两个字。在底下的卷轴上用罗马字体写着“第一中国军团”和“天津”。

“阅兵式”上的沉默

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城发动总攻。英军于中午才到达北京,巴恩斯中尉带领100名中国军团的士兵运送重型机枪和各国的大炮,行走不便,在最后几天,这些机枪和火炮基本上是用人力运达北京的。而希尔上尉带领华勇营第五连30名士兵,护卫一队装满弹药的独轮车。这一幕给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联军总指挥、德国海军上将盖斯里,为了中国军团的出色表现特别颁布了一道嘉奖令。

8月28日,联军在紫禁城里举行了庆祝胜利的阅兵式。

早晨七点,联军在大清门前集中,然后八国联军、北京各外国使馆的使节和使馆卫队列队进入紫禁城。在乐队的伴奏下,联军队伍乱哄哄地喊着号子,尽兴地呼叫。

华勇营的士兵在巴恩斯中尉的带领下,走在受阅的英军队列中,香港军团与中国军团最后出场。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这些年轻的中国人应该是第一次走进这个皇宫。尽管外国士兵们觉得“这真是一个壮观的场面,……情不自禁想要拥抱、叫喊、舞蹈,或者诸如此类的疯狂举动”,但是中国军团的士兵们始终沉默着。细腻敏感的巴恩斯察觉到他的部下的表情。他写道:“在阅兵仪式上,让那些中国人照顾这个被掠夺的城市,实际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他们静默的脸上写满了悲伤,……特别是当我们接近帝王生活的宫殿时,你可以发觉他们脸上充满了鄙夷与不屑和一种非常糟糕的表情。毋庸置疑,他们的心情比他们的表情还要糟糕。”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尊卑等级观念,在这一刻让这群中国青年的心里激起巨大的波澜。此刻他们正站在这个威严的封建权力的最高中心,他们不能不感到颤栗。但是,他们一如从前一样静默着。

紫禁城阅兵后,中国军团遵从联军的统一部署,分别进驻京畿的几处军事要地。主要是在有“津门首骚”之称的重镇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由巴恩斯统一指挥。在他的123名士兵中,有70人来自华勇营第四连,他们成为这个驻守河西务的主力部队。巴恩斯有意识地利用中国军团的士兵们特殊的身份,对当地村民进行管理,因此河西务一地比八国联军的其他驻地更早地进行了战后重建。同样地,驻守在通州的华勇营第五连也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甚至有些村庄主动要求华勇营派兵长驻,以防止频繁的土匪骚扰和劫掠。1900年10月21日,华勇营才回到威海卫。

1905年8月,英日第二次签订了同盟条约,威海卫的防御压力大为减轻,华勇营失去了利用价值。1906年6月,这支风光一时的雇佣部队被解散。华勇营尽管得到了英军的褒奖,但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已经被打上“汉奸”的耻辱印记。

(摘自中国青年网)

民国时代的汽油荒

□李开周

彻夜排队加油

1948年12月,上海四川中路与广东路交叉口,一座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轿车、卡车、出租车、摩托车、公共汽车……各种车辆穿插排列,车与车之间还能见到许多夹着蓝布铺盖卷、扛着铅皮汽油桶的老太太。这条人车混杂的队伍排得很长,从加油站排到了广东路,又从广东路一直延伸到了外滩。即使站到街边最高的大楼上,也望不到队伍的尽头,好像一条正在缓缓蠕动着超级巨蟒。

不用问,这些车都是来加油的,那些夹着铺盖卷的老太太也是来加油的。

加油干嘛要带着铺盖呢?因为加油的人实在太多,等待加油的时间实在太长,有的人已经整整排了48个小时的队,仍然没有加到油。48个小时,那可是两天两夜,12月份的上海已经变冷了,加油的时候如果不带着铺盖,晚上会冻出病来的。

事实上,这些人不但带了铺盖,还带了干粮和水。叫卖粽子和生煎的小贩也找到了商机,既能向大家兜售食品,还能挣到替人排队的小费。

我们现代读者见到上述场景,估计会感到诧异。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排过这样的长队,几年前经济适用房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有些朋友为了赶场摇号,同样是排队排到绝望。可是我们绝对不可能因为加油而排队两天两夜,更不可能排上两天两夜还加不到油。

如果您扮成记者,去采访这支加油大军:“大家如此执着地排队加油,是因为油价马上要涨了吗?还是因为这个加油站正在搞一个非常优惠的促销活动呢?”他们会摇摇头,然后告诉您三个字:汽油荒。

一眼药瓶那么多的汽油,叫价三万元

所谓“汽油荒”,是指汽油短缺,市场上的供应满足不了需求。

民国时代的中国是个贫油国,从1912年到1949

年,国产原油的总产量不到两百万吨,同期进口的“洋油”总量却高达两千万吨。也就是说,老百姓要加油,主要靠进口。

进口货当然要贵一些。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年,北京前门某药店代销英国壳牌汽油(早期北京没有加油站,汽油由洋行代销),一加仑卖到两块大洋,比英国本土贵一倍左右。当时鲁迅家的保姆月薪也是两块大洋,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月薪是八块大洋,骆驼祥子省吃俭用拉一月洋车的收入约五块大洋。他们当然没有汽车,即使有车,也加不起油。

最初汽油只是贵,并不缺,因为私家车极少,机关用车也不多见,汽油消耗量不大。到了抗战时期,国军要用油,日军要用油,来华援助的美国飞行员更离不开汽油,战争消耗汽油的速度比什么都快,于是出现严重短缺。

国民党政府在陪都重庆提出一个口号:“十万青年十万军,一滴汽油一滴血。”意思是组织青年参军抗日,同时呼吁国民节约汽油。日伪政府则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搞起“火油管制”,禁止市民用汽油炉做饭,限制大家点煤油灯的时间。

1945年,日军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了,可是国共内战又打响了,汽油短缺的现象非但没结束,反而更加严重了。倒不是说国共内战比抗日战争需要更多汽油,而是因为二战之后全世界都在闹油荒,为了保证本国的供应,美国政府一度停止向我们出口汽油。

1948年,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汽油零售价飞涨,一份报纸上刊登出消息:“在玻璃柜里,一小瓶眼药水瓶大的玻璃瓶里的汽油,作灌入打火机用的,原本是一万元,现今是三万元。”

1948年1月6日,德士古公司北京分部规定汽油每加仑零售价上调至五十万元,相当于纱厂经理一个月的工资。民国汽车较为耗油,当时福特公司出

产的家用T型车,五个座位,加一加仑汽油,只能在城区行驶十公里。

汽油涨到如此地步,老百姓肯定是加不起的,有钱人也不一定舍得开车上街,照理说加油站已经没有生意了。可是不然,在上海、南京、天津、广州,这些大城市的加油站前都排起了长队,有车一族来加油,没车的老百姓也来加油。几户人家共同集资,凑出钱来加一桶汽油,回家埋到地底下,过一个月再卖掉,换钱买米。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汽油一天一个价,比黄金涨得都厉害,买了汽油囤起来,可以抵消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

国民党政府出台限油令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输送油料管理委员会”,简称“输管会”。这个机构成立的初衷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严重短缺的汽油进行合理配给,最大限度减少民间的汽油配额,优先保证军队和工厂的配额。

1947年7月,输管会出台《各级加油站供给办法》:“甲种加油站每日供油九百加仑,乙种加油站每日供油七百加仑,丙种加油站每日供油二百加仑。”

194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出台《私人汽车使用限制办法》:“私人汽车用油凭行车执照,每三个月向当地主管交通管理机构领取购油证,所需汽油每辆每月以六十加仑为限。违反规定者,由交通管理机构吊销其牌照与行车执照。”

也就是说,私家车想去加油站加油,必须带着政府发给的“购油证”,没有购油证就不许加油。每加完一次油,加油站的人就在你的购油证上填上数字,填够六十加仑,你这个月就不能再加了。

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又把私人汽车的每月

加油限额降低到二十加仑。前面说过,一加仑汽油只够跑十公里,二十加仑自然是二十公里,从通州开车来一趟市区,一个月的加油限额就用完了。

烧油汽车纷纷改烧炭

有车而加不到油,只能把车束之高阁。民国报纸上刊登过一篇《男女明星的脚踏车热》,说胡蝶、周璇、陈娟娟、陈云裳、顾兰君等等上海滩大明星原先都有汽车,因为政府限油,所以开始骑自行车,“电影界里四轮变两轮之风盛极一时”。

可是运货的卡车和拉座的公共汽车不能停啊,于是各种各样的“新能源”应运而生:煤炭车、木炭车、桐油车、酒精车,纷纷上路。

木炭汽车最流行:请人简单改一下发动机,然后在车身后面装一个“煤气发生炉”,炉子上面放一个水罐,炉子旁边接一根管子,往发动机上一接,木炭车就成了。开车之前,把木炭装入炉子,生火点着,待炉子里的炭烧到一半,打开水罐,滴入冷水,使木炭不完全燃烧,产生煤气,然后再拉开车门,用摇柄摇车点火。

木炭燃烧很快,平均每跑二十公里就要加一次炭。所以在当年的京津公路上,每隔二十公里就设有一处“加炭站”,防止长途汽车熄火趴窝。假如错过了加炭站,客车无法前行,司机只好发动乘客下去找木柴。

最奇葩的是上海街头还出现了马拉汽车,当时新民报主笔张慧剑写道:“上海油竭,汽车作废者以数万计,最近乃有人试行马拖汽车,拆去前部引擎或更去篷顶,减车重,以马曳之,疾行于光滑之沥青路上,速度约为每六分钟一公里。”

(摘自《北京青年报》)



中国最后一批太监的归宿地

□陆波

太监们是没有故乡的人，他们是10岁左右的男孩，有些可能更小，懵懂间被净身，带往令他们曾经构筑梦幻的京城。故乡的大门，在他们的身后重重地关上。飞黄腾达的太监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走入深宫后，便是一生的苦役劳作，甚至可能一生从未见过皇上的面。

他们年老体衰离开皇宫后，大致流转至三个方向终老：

第一类，极少数太监会被至亲接纳，回到故乡养老。但这些人是个别的幸运者，因为太监入宫基本上为亲人不耻，已被排斥为非男非女的异类，如果不是贪图太监出来有可能带来的那点银子或者基于太监在宫内劳作期间给家乡亲人回馈的供养，那么即使是至亲也很难接纳他们。

第二类，极少数的高级太监管家，比较伶俐能干又能攀附上宫内关系，属于混得好的，一生工作攒下了些资产，在京城买房置地，甚至娶老婆收过继儿子。有闲不住的，继续受聘给有钱人家做管家，颐养天年时也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顶级的例子就是李莲英，应该算是太监首富。有传言说，他的4个过继儿子各得白银40万两，另有一大口袋珠宝。其他各侄儿各分得白银20万两，他的两个过继女儿各分得17万两白银。此外，李莲英在宫中还存有300多万两白银和两箱珠宝，但他早已知道这些财宝不可能属于他了，因此非常“明智”地告诉后人，不要再想这件事了。当然，这些财富只是他所聚敛财富的一部分，而且还不包括数额巨大、价值不菲的几处房产。

第三类，属于中下层的太监们，投奔并依附散落于京城各地的庵庙寺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能动了，就烧香拜佛等待生命终结。众所周知，太监不可能有直系子嗣，都是“绝户”，不但被世俗社会也被自己的亲属所蔑视及抛弃，不仅如此，“挖绝户坟”也

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北京海淀中关村地区的变迁就是“绝户”铲除的最好范例。

二

中关村坐落在永定河故道之上，有时断续的旱河，因为低洼曾是一片自然沼泽没有多少人烟。因为河流故道的缘故，这里曾叫“中湾儿”（也可能是“转弯儿”的谐音），大约是河道在此转向北，也就是转向京城北郊的清河方向。

由于地处荒郊野外，不知何时起被太监们看中，加之这里的土地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一定不值钱，就不断有太监购买，称为“义地”，修建各类小小庙庵。太监们身体灵便尚能活动的时候，就来上香祈福，诚心供养，年老体衰后就扎堆生活彼此照应，死了就在附近埋葬。由于太监也被称呼为“中官”，所以从“中湾儿”到“中官屯”或“中官村”如此延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选中这一地址开发建设科学城，当然就是大面积的平坟拆庙，“挖绝户坟”。反正“绝户”坟也是可以随意处置的，而“中官”一词，科学家们认为刺耳，在北师大校长陈垣先生的提议下改名为“中关村”。

从中关村这个例子可知，太监们年老之后只有相互投靠彼此取暖。那么，何人何地能够收容那些并没有聚下足够资财且年老无依的出宫太监呢？当年，没有养老机构，没有收容院，有的只是寺院。

三

明清至民国期间，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寺院庙庵有几千个，凡是修佛、修道及其他民间鬼神的太监均可以投靠适当的场所。基于佛、道宣扬的众生平等且修好来世的思想，正好契合了太监们找到开脱自己悲惨命运的本愿，以此获得心理平衡。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寺院是与太监们的供养有关系的，它一方面收纳信众供养以助香火，另一方面也是太监们为年老退休之后寻到一方归隐养老之

所,便长期化地积累资粮。乾隆年间开始,有太监自发组织的养老组织“养老义会”出现,旨在以太监共同筹资的方式运作寺院的养老机制。太监尚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每月给特定的寺院提供一定的供奉,待年老体衰即可由该寺院接纳为其养老送终。

清末民国北京有几个寺院是以接收退休太监闻名的。首推万寿兴隆寺,这座寺院今天依旧保存良好,坐落于皇城之侧的北长街39号。由于这座寺院比较早的建立过养老义会,基本收留的是一些相对有些收入的中上层太监,算是比较高级的太监养老寺院。另一类是以比较有地位有财力的太监出资购地兴建的,包括购买寺院附近的土地,以出租土地房屋收益维持寺院生计,如李莲英、刘诚印、崔玉贵等大太监,还有某些有文化修养且懂管理的太监如信修明,他们资助的代表性寺院如白云观、立马关帝庙、褒忠护国祠等,这一类寺院基本是免费接收孤苦无依的离宫太监。

其中最慷慨大方的善人是刘诚印,他参与资助或者主办的寺庙30余座。因为他是道教徒,也是地位仅次于李莲英的大太监管,对于清末太监大批皈依道教起到很大作用。信修明是清朝末期入宫(1902年),民国建立后出宫的太监,大约在宫内10年。因为他是个秀才比较有文化,留给后世一本《老太监的回忆》一书,提及他成立了恩济慈善保首会,专门免费收养太监的事情。直至新中国更迭民国的1949年,他仍旧担任位于今天八宝山的褒忠护国祠住持。当然这个褒忠护国祠随即由新政府征收,并在此地建立了今天的八宝山公墓。

上面提及的三座庙宇,其中白云观今天是文物保护及道教文化的景点,也是香火旺盛的道观。2001年6月,白云观作为清代古建筑,且是著名的全真派一脉相承的道教道场,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而褒忠护国祠作为一座收养太监的祠庙,也不可能在八宝山公墓的故址上复原,已永久性消失。唯独立马关帝庙,既没消失也没被保护,甚至是处于一种破败不堪的很不体面的处境。

立马关帝庙位于昆玉河西畔海淀区蓝靛厂大街东端,与蓝靛厂北路相交。建筑院落坐北朝南,分为东、中、西三路,院落为三进,东路是关帝庙部分,中路和西路曾经是太监们的居所。

现在,立马关帝庙的院落结构保存基本完整,但西路的部分房屋比较凌乱,满地砖头瓦块还有拆了一半的残垣,然后有临街的什么零件配件商店,洗车行等,估计是倚着西院的院墙或者干脆就是在西院拆掉的地基上搭建的,所以西路房屋的改变情况比较严重。有些资料说该关帝庙是两进院,是错误的。总体规模看它是三路三进院,彼此相连应该是九个院落。东路、中路不仅结构完整,房屋也并未过度拆改。东路有完整三大殿,依稀看出当年的气派。

刘诚印死在任上。他倾尽心血捐建寺社,但自身并没有受益于他捐资建立的三十余间寺院的任何一间。李莲英为慈禧太后守孝后退休离宫,回到自己崇文门外宅邸度过了最后三年的退休生活,便也谢世了。但无论如何,这两位有头脸的太监头领引领的捐庙善举,多少也得到皇家的一些帮助,也算是为太监退休安置找到了一条官民共襄之道。

立马关帝庙作为京西比较大规模的太监养老庙,接纳了众多并不是很有钱的老太监,因为这里不像万寿兴隆寺那样有“养老义会”制度,这里更像是慈善机构。那位接替刘诚印的慈禧后期的太监二总管崔玉贵(这位最出名的事是庚子之乱将珍妃推下水井),也在慈禧去世后随同李莲英出宫,就落户在立马关帝庙。他用自己的积攒的银两为寺庙购买了周边680亩稻田,与他的徒弟及众多还有劳力的太监以种稻为生,直至1926年去世。

四

新中国建立后的土改运动中,太监们因为有稻田庙产被划入地主阶级,他们被集体轰至长河东岸的长春桥村,也就是说他们从长春桥跨河,从西侧的关帝庙搬至东侧的长春桥村。长春桥村的大致位置在今天的海淀区政府大楼、北京大学万柳宿舍一带,离历史上乾隆敕建的泉宗庙很近。

居住在这一带的人曾回忆,50年代长春桥村一带有高低土坡,偶尔会看到面色苍白老迈体弱的太监在其中散步。在长春桥村居住的太监有张自光、赵荣升、边法长、侯长贵、张修德、池焕卿、孙耀庭、老郭三和蔡当家的。这大约还算是些有头脸的太监。再后来,他们被集中到万寿兴隆寺及后海广化寺生活,也就随着时间流逝,自然规律,逐渐离开他们痛苦的世间生活。

(摘自《家庭与生活报》)